

当代中国青少年校园欺凌受害模式探索: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谢家树¹ 魏宇民¹ ZHU Zhuorong²

(1. 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湖南师范大学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081;
2.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0900 Euclid Ave., Cleveland Ohio 44106, USA)

摘要: 采用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和广泛性焦虑量表对湖南省八个地区 20 所中学初一到高三 3761 名学生进行调查, 探索学生欺凌受害模式, 并对不同模式亚群体的人口学特点及其心理健康状况展开研究。结果发现: (1) 校园欺凌中, 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这四种常见欺凌类型具有较高的共发性, 潜在剖面分析表明存在四种典型的校园欺凌受害模式“所有类型欺凌受害组”(1.5%)、“传统类型受害组”(3.9%)、“传统类型轻卷入组”(14.9%)和“未受害组”(79.6%); (2) 欺凌受害模式的人群分布受不同人口学特征(性别、年级、学校位置、自评学习成绩)的影响, 男性、初中、乡村学校、成绩较差的学生更易受到欺凌; (3) 即使是轻度的欺凌受害卷入, 也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对校园欺凌行为“零容忍”确有依据。

关键词: 欺凌受害; 共发性; 潜在剖面分析; 青少年; 心理健康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欺凌受害(Bullying victimization)指个体长时间或反复受到一个或几个同伴欺凌或伤害的现象(Olweus, 1993), 具有力量的不均衡性、蓄意性、重复性、伤害性等特点(Smith & Wilson, 1998), 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Gini, & Pozzoli, 2009; Hawker, & Boulton, 2000)。有研究表明欺凌受害者在社会和情绪问题上存在更高的风险, 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内向性问题(Menesini, Modena, & Tani, 2009; 李海垒, 张文新, 于凤杰, 2012)。在卷入欺凌的各类人群中, 欺凌受害者的占比最高, 如一项对挪威数万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 约15%的学生卷入欺凌, 其中欺凌受害者约占9%(Olweus, 1993); 意大利中小学中的欺负问题更为严重: 29%的儿童属于欺凌受害者, 13%的儿童既属于欺凌者同时也是欺凌受害者, 8%的属于欺凌者(Genta, Menesini, Fonzi, Costabile, & Smith, 1996); 国内研究者张文新(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近五分之一的中小学生卷入了校园欺凌, 14.9%的学生属于欺凌受害者; 一项中美校园欺凌受害问题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22.05%的美国学生和21.77%的

中国学生遭受过欺凌(谢家树, 谢璐, Yang, Bear, 凌宇, 2016)。

对欺凌受害者而言, 受欺凌是一个严重的生活事件, 相比一般生活事件, 欺凌受害的重复和持续性特点使得其对个体身心的影响更为深远。不仅如此, 欺凌存在包括言语欺凌、关系欺凌、身体欺凌在内的传统欺凌以及近年来出现的网络欺凌等多种形式(Crick & Grotpeter, 1995; Olweus, 1993; Björkqvist, 1994; Smith, Mahdavi et al, 2008), 多项研究表明, 各欺凌形式间具有较高的共发性(Raskauskas, & Stoltz, 2007; Li, 2007; Smith, Mahdavi et al, 2008; Nylund, Bellmore, Nishina, & Graham, 2007; Wang, J, Iannotti, Luk, & Nansel, 2010; 张兴慧, 李放, 项紫霓, 王耘, 2014; 黎亚军, 2015), 大多数欺凌受害者通常遭受不止一种形式的欺凌。在欺凌受害人群内部, 个体受到的欺凌形式及其组合各不相同, 受欺凌的严重程度存在差异, 欺凌受害群体具有异质性。

以往校园欺凌研究包括对欺凌受害者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欺凌受害对个体心理健康内、外向性问题影响的研究等(张文新, 谷传华, 王美萍, 王益文, & Kevin Jones, 2000; Schwartz, Chang, & Farver, 2001; 张文新, 2002; 陈世平, 乐国安, 2002; 陈健芷, 刘昭

* 基金项目: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青少年欺负受害与抑郁关系的追踪: 基于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的研究”(2017JJ2184)。

通讯作者: 谢家树, xjiashu@hunnu.edu.cn

阳,刘勇,2013;吴方文,宋映泉,黄晓婷,2016),这些研究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忽略了欺凌受害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积极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弹性研究表明,相比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处境不利个体群体内部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更值得关注(Rutter,2000;王丽霞,汤永隆,2016;张华,丁新胜,王庆云,韩成秀,2016),了解欺凌受害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可以帮助人们区分不同性质的欺凌受害亚群体,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模式亚群体深入研究,以期在制定欺凌防治和干预方案时,可以为不同亚群体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方案。本研究对校园欺凌受害模式的探究,即是在考察欺凌受害异质性特点的基础上,对各类欺凌受害模式的人口学特点及其心理健康状况展开研究。

近年来,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被广泛用于社会学、生物医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异质性群体分类研究中。潜在类别分析是一种基于个体对外显变量的反应选择倾向将个体分为少数互斥的潜在类别变量的技术(邱皓政,2008)。使用LCA进行分类,可以保证各潜在类别之间差异最大,类别内部差异最小,同时可以根据各类别在量表各条目上的作答模式来判断其潜在特征并了解各类别在整个群体中的人数比例,从而探索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分类模式。

纵观已有的校园欺凌潜在类别研究,Wang等(2010)对美国青少年受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排斥、谣言中伤与网络欺凌的发生状况所做的LCA将被试划分为三类:全类型受害组(男9.7%,女6.2%),言语/关系受害组(男28.1%,女35.1%),未受害组(男62.2%,女58.7%);国内相关研究,张兴慧等(2014)以4、6和8三个年级学生受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的发生状况进行的潜在类别分析将被试划分为言语-身体(10.8%),言语-身体-关系(10.6%),言语-关系(5.8%),未受害(72.9%)四类;黎亚军(2015)对二所学校7、8、10、11年级被试分析得到所有类型受欺负(10.3%),网络/言语/关系受欺负(47.5%)和非受欺负(42.2%)三类。这些研究所采用的工具、涉及的人群以及得出的研究结果均存在不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中对欺凌受害的测量采用的都是多点计分,因而在使用LCA时,需先按照某一临界标准将原始分转化为0/1类别计分,再进行后续分析。由于离散数据本身精确性上有所不足(张洁婷,焦璨,张敏强,2010),把连续数据转换为离

散数据进行分析会丢失数据信息,从而导致分类结果发生偏差。因此,本研究将使用潜在类别分析在观测变量为连续变量时的方法延伸——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苏斌原,张洁婷,喻承甫,张卫,2015),可以更精确地探讨中国青少年欺凌受害模式。

综上,本研究拟先对包括网络欺凌在内的四种常见欺凌受害形式的检出状况进行共发性特点研究,之后以四种欺凌受害形式的数据结果构建LPA模型,探索当下中国青少年不同欺凌受害模式及其主要的人口学特性。在充分考虑欺凌受害群体内部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欺凌受害模式人群的内向性问题(抑郁、焦虑)及其差异。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采取整群取样法对湖南省八个地区20所中学(其中城市学校13所,乡镇和农村学校7所)3788名初一至高三(年龄范围11~20岁, $M_{\text{年龄}}=15.03$, $SD=1.685$)的学生进行调查,去除人口学变量信息(如:性别)缺失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761份,有效率99.29%。详细取样信息见表1。

表1 被试分布表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总计
男生	197	244	234	462	310	376	1823
女生	224	233	254	459	414	354	1938
总计	421	477	488	921	724	730	3761

2.2 研究工具

2.2.1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

采用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DBVS-S)2016年中文修订版。该量表总共有17个条目,分为四个维度:言语欺凌(4个条目)、身体欺凌(4个条目)、社会/关系欺凌(4个条目)和网络欺凌(4个条目),其中第13条“我在这所学校被欺凌了”作为筛查条目,不计入数据分析(Bear, Yang, & Mantz, 2016),该量表由谢家树等(2015)引进,本研究采用的是最新修订的中文版(谢家树,魏宇民, & Bear, 2018)。本次取样收集数据中DBVS-S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6,四因子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良好(CFI=0.922, RMSEA=0.043 [0.040-0.046])。量表采用Likert六点计分,“1”表示“从来没有”,“2”表示“偶尔”,“3”表示“一个月一两次”,“4”表示“一个星期一次”,“5”表示“一个星期多次”,“6”表示“每天都有”,得分越高说明

被欺凌现象越严重。

2.2.2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采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目的是评估被试过去两周抑郁症状的发生频率。该量表总共9个条目, 其中第9个条目“是否有自杀或自残的念头”因考虑本研究目的并非临床干预, 检测自杀或自残念头, 研究者无法对答项为阳性的被试提供进一步干预, 基于伦理考虑, 参照国外同类研究的做法, 本研究未将其纳入, 施测时只采用了前8个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 四点计分, “0”表示“完全没有”, “1”表示“有几天”, “2”表示“超过一半的天数”, “3”表示“几乎每一天”, 得分越高说明抑郁症状越严重。PHQ-9 修订时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0(胡星辰, 张迎黎, 梁炜, 张红梅, 杨世昌, 2014)。本次取样数据中 PHQ-9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4, 一因子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良好(CFI = 0.933, RMSEA = 0.074 [0.068 - 0.080])。

2.2.3 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

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 目的是了解被试在过去两周焦虑症状如紧张、担忧等的发生频率。该量表总共7个条目组成, 量表采用 Likert 四点计分, “0”表示“完全没有”, “1”表示“有几天”, “2”表示“超过一半的天数”, “3”表示“几乎每一天”, 得分越高说明焦虑症状越严重。GAD-7 修订时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曲姗, 胜利, 2015)。本次取样数据中 GAD-7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4, 一因子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标良好(CFI = 0.973, RMSEA = 0.063 [0.056 - 0.071])。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数据收集方式全部为纸质问卷调查,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施测前与取样学校充分沟通, 取得学校支持并得到所有取样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施测主试均为专门培训过的心理学研究生, 每班配备1或者2名主试, 施测时间为学校大课间或者自习课, 被试完成问卷时长约15分钟, 施测时要求其班主任在场(仅在场不巡视), 主试向被试详细讲解指导语和例题, 在指导语中说明本次调查的意义并反复强调施测内容仅用于科研和大样本分析, 问卷当场由主试收回并带走, 不会给其学校或老师查看。取样从2016年12月初开始, 时间跨度一个月。

2.4 统计工具

本研究使用 Mplus 7.4 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对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多项 logistics 回归分析和方差分

析使用 SPSS 22.0 进行处理。

3 结果分析

3.1 不同欺凌类型发生率及共同发生百分比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为6点计分量表, 在进行数据处理时, 只要在任一条目得分 ≥ 3 , 即选择“一月一两次”及以下的被试, 就认为受到了该条目所在维度所代表的欺凌。个体受到言语、身体和关系中任一种及以上类型的欺凌, 都被归属为传统的欺凌受害类型。

四种欺凌受害类型的发生率分别为: 言语欺凌, 31.53% (男生 37.74%, 女生 25.70%); 身体欺凌, 20.55% (男生 27.65%, 女生 13.88%); 关系欺凌 19.60% (男生 22.65%, 女生 16.72%); 网络欺凌, 4.3% (男生 5.76%, 女生 2.94%)。从男女生受欺凌人数的比例看, 男生受欺凌的比例(51.01%) 高于女生(34.47%)。男生受欺凌类型中人数最多的是言语欺凌, 次多的是身体欺凌; 女生受欺凌类型中人数最多的是言语欺凌, 次多的是关系欺凌。每一类型受害者同时受到其它类型欺凌的百分比见表 2: 网络欺凌发生时, 传统欺凌同时发生的概率为 87% (男生 89.5%, 女生 82.5%), 传统欺凌发生时, 网络欺凌同时发生的概率为 9.8% (男生 11.4%, 女生 7.7%)。

表 2 四种欺凌类型共同发生百分比^a

	传统欺凌受害类型				网络欺凌 (%)
	言语欺凌 (%)	身体欺凌 (%)	关系欺凌 (%)	传统欺凌 (%) ^b	
全样本 (n = 3761)					
传统欺凌 (n = 1436)					9.8
言语欺凌 (n = 1186)	-	53.7 ^c	50.1 ^c		10.6 ^c
身体欺凌 (n = 773)	80.9	-	62.0		15.5
关系欺凌 (n = 737)	80.6	65.0	-		16.8
网络欺凌 (n = 162)	77.8	74.1	76.5	87.0	-
男生 (n = 1823)					
传统欺凌受害 (n = 825)					11.4
言语欺凌 (n = 688)	-	59.0	50.6		12.1
身体欺凌 (n = 504)	80.6	-	61.9		16.5
关系欺凌 (n = 413)	84.3	75.5	-		20.1
网络欺凌 (n = 105)	79.0	79.0	79.0	89.5	-
女生 (n = 1938)					
传统欺凌 (n = 611)					7.7
言语欺凌 (n = 498)	-	44.08	49.4		8.6
身体欺凌 (n = 269)	81.4	-	62.1		13.8
关系欺凌 (n = 324)	75.9	51.5	-		12.7
网络欺凌 (n = 57)	75.4	64.9	71.9	82.5	-

^a 每种类型的受害者中, 受到其他类型欺凌的百分比。

^b 如果个体受到言语欺凌、身体欺凌、社会排斥中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的欺凌, 则认为是传统的欺凌受害类型。

^c 例如在 1186 个言语欺凌受害者中, 53.7%, 50.1%, 10.6% 分别是身体欺凌, 社会排斥, 网络欺凌的受害者。

从四种欺凌受害类型的共发性特征上看,言语欺凌的共发率最高,身体、关系、网络欺凌受害者通常也是言语欺凌受害者;三类传统欺凌受害形式间共发性均高;中国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发生则常伴随传统欺凌而发生。

3.2 青少年欺凌受害的潜在剖面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探究青少年群体中欺凌受害模式,本研究接下来将根据各欺凌类型的发生程度(即发生频率)进行潜在剖面分析。抽取 2~5 个类别的拟合指数汇总表 3 对其进行模型比较。模型适配检验指标主要有:信息评价指标 AIC、BIC 和样本校正的 BIC (sample size-adjusted BIC, aBIC) 和 Entropy 指数,似然比检验指标 LMR-LRT 和基于 Bootstrap 的似然比检验(BLRT) 指标。三个信息评价指标越小表示模型拟合得越好 Entropy 指数的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越接

近 1 表明分类越精确, Entropy < 0.60, 相当于超过 20% 的个体存在分类错误, Entropy = 0.8 表明分类的准确率超过了 90%。LMR-LRT 和 BLRT 两个指标的 p 值达到显著水平, 则表明 k 个类别的模型显著的优于 k-1 个类别的模型(邱皓政, 2008)。

数据表明,各个信息指标显示的结论并不一致,5 个模型的 Entropy 值均超过了 0.8,保留 5 个类别时 BIC 最小,但是 5 类别时 LMR-LRT 值不显著,说明 5 类别模型并不优于 4 类别,4 类别的 LMR-LRT 和 BLRT 指标均显著,4 类别的青少年(行)归属于每个潜在类别的平均概率(列)从 94.0% 到 99.0%,综合考虑后,选择 4 类别为最佳模型(Nylund, Asparouhov & Muthén, 2007)。4 潜类别模型在欺凌受害 16 个条目(去掉原量表第 13 题后按维度重新排序)上的估计条件均值见图 1。

表 3 潜在剖面分析拟合信息汇总表

指标	模型数				
TOTAL(n = 3761)	2	3	4	5	
AIC	134874.143	127284.693	123542.594	118438.308	
BIC	135179.532	127696.034	124059.887	119061.552	
aBIC	135023.834	127486.318	123796.153	118743.799	
Entropy	0.991	0.988	0.962	0.994	
LMR-LRT(p)	<0.001	0.1096	0.0261	0.6154	
BLRT(p)	<0.001	<0.001	<0.001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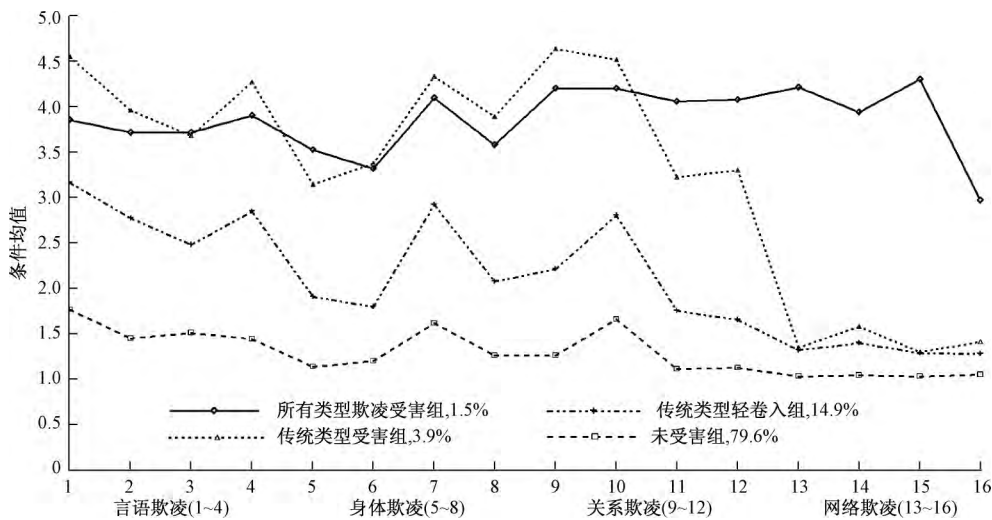


图 1 欺凌受害四个潜在类别的估计条件均值

从图 1 可知,4 个潜类别在欺凌受害 4 个因子 16 个条目(图中折线由上到下为类别 1 到类别 4)上的条件均值差别明显,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其中,类别 1(Class1, C1) 在四个欺凌维度的条件均值都高,这类人数占全体被试的 1.5%,根据其得分特征,把 C1 定义为“所有类型欺凌受害组”。类别 2

(Class2, C2) 在网络欺凌维度的条件均值明显低于 C1,在 1~12 条目即传统欺凌受害三个维度上的得分趋势及条件均值与 C1 相近,定义为“传统类型受害组”,占全体被试的 3.9%。类别 3(Class3, C3) 在传统欺凌受害三个维度的得分趋势与 C2 相近,但条件均值均低于 C2,其在网络欺凌维度的条件均值

与 C2 一致, 由此将 C3 命名为“传统类型轻卷入组”, 人数占全体被试的 14.9%。类别 4 (Class4, C4) 在所有条目的条件均值均很低, 命名为“未受害组”, 占全体被试的 79.6%。

3.3 人口学变量对 4 个潜类别组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结果

本研究在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上, 进一步探讨欺凌受害模式的人口学特性。以 LPA 结果作为因

变量, 性别(女性为参照)、年级(高三为参照)、学校类型(城市为参照)、寄宿情况(走读为参照)、自评学习成绩(成绩较差为参照)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 其中未受害组(C4)作为比较参考类别, 分析得出 Odd Ratio 系数, OR 系数反映了不同性别、年级、城乡位置、寄宿情况、自评学习成绩在各欺凌受害潜在类别的比值比。多项 logistic 回归的结果见表 4。

表 4 不同人口学变量对 4 个潜类别组的多项 Logistic 回归结果

		所有类型受害组(C1)		传统类型受害组(C2)		传统类型轻卷入组(C3)	
		OR	CI(95%)	OR	CI(95%)	OR	CI(95%)
性别	女	1.000		1.000		1.000	
	男	4.241**	2.303-7.809	1.794**	1.275-2.523	2.338**	1.925-2.838
年级	高三	1.000		1.000		1.000	
	初一	9.471**	3.741-23.977	15.029**	6.636-34.038	3.803**	2.703-5.349
	初二	3.609*	1.296-10.050	11.070**	4.876-25.131	3.372**	2.425-4.689
	初三	1.991	0.636-6.237	8.402**	3.658-19.295	2.635**	1.883-3.688
	高一	1.237	0.437-3.500	2.096	0.870-5.052	1.084	0.781-1.504
	高二	1.338	0.446-4.015	2.147	0.860-5.361	1.067	0.751-1.517
学校位置	城市	1.000		1.000		1.000	
	乡村	5.238**	3.062-8.961	4.513**	3.216-6.331	2.824**	2.340-3.409
寄宿情况	走读	1.000		1.000		1.000	
	寄宿	1.342	0.745-2.149	1.427	0.982-2.074	1.037	0.854-1.258
学习成绩 (自评)	较差	1.000		1.000		1.000	
	中等	0.613	0.337-1.116	0.563*	0.381-0.831	0.775*	0.617-0.973
	优良	0.400*	0.172-0.935	0.534**	0.326-0.876	0.751*	0.570-0.990

注: *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下同。

以未受害组(C4)为参照组, 将所有类型受害组(C1)、传统类型受害组(C2)、传统类型轻卷入组(C3)与其进行比较, 比值比(OR)结果显示欺凌受害模式的人群分布受性别、年级、学校位置、学生成绩的影响, 寄宿情况的影响不显著。

与女生相比, C1、C2、C3 三组中, 男生中的欺凌受害现象均更多; 与高三学生相比, C1 组中, 初一、初二的欺凌受害现象更多, 初三、高一、高二学生中的欺凌受害现象与高三学生无显著差异, C2、C3 组中, 初中三个年级的欺凌受害现象更多, 高一、高二学生中的欺凌受害现象与高三学生无显著差异; 与城市学生相比, C1、C2、C3 三组中, 乡村学生中的欺凌受害现象均更多; 寄宿和走读生的欺凌受害现象无显著差异; 与成绩较差的学生相比, C1 组中, 成绩

较差和成绩中等的学生欺凌受害现象无显著差异, 成绩优良学生较成绩较差学生欺凌受害现象更少, C2、C3 组中, 成绩中等、成绩优良的学生相较成绩较差学生欺凌受害现象更少。

3.4 青少年欺凌受害各潜在类别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得分比较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5, 不同欺凌受害潜类别组青少年的抑郁得分 ($F(3, 3757) = 104.136, p < 0.01, \eta^2 = 0.077$) 和焦虑得分 ($F(3, 3757) = 121.953, p < 0.01, \eta^2 = 0.089$) 差异显著。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C1 组的抑郁和焦虑分数显著高于其他三组, C2 组的抑郁和焦虑分数低于 C1 组, 显著高于 C3 组和 C4 组, C3 组的抑郁和焦虑分数显著高于 C4 组。

表 5 各潜类别组在抑郁、焦虑症状上的差异比较

	C1 (n=58) M ± SD	C2 (n=147) M ± SD	C3 (n=544) M ± SD	C4 (n=3012) M ± SD	F	η^2
抑郁	11.90 ± 6.072	10.60 ± 5.004	8.80 ± 4.427	6.60 ± 4.037	104.136**	0.077
焦虑	10.43 ± 4.946	9.18 ± 4.881	7.54 ± 4.390	5.09 ± 3.949	121.953**	0.089

4 讨论

4.1 青少年校园欺凌受害模式共发性特点及其异质性

本研究使用潜在剖面分析对四种常见欺凌形式的发生模式进行探索,受测的青少年存在四种欺凌受害模式:所有类型欺凌受害组,传统类型受害组,传统类型轻卷入组和未受害组。各组在欺凌受害各类型上的得分和趋势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了欺凌受害群体存在异质性。四种模式中有三个欺凌受害组(C1、C2、C3),三组的总占比为20.4%,其中轻卷入组人数最多,所有类型受害组人数最少,这说明欺凌受害现象在当下我国校园中普遍存在,各类型分布呈金字塔形,欺凌受害程度越严重人数越少。

三组欺凌受害组中,C1、C2组均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传统欺凌,C3组受到了中等程度的传统欺凌,由此可见,传统欺凌三种形式通常伴随发生,从条件均值上看,言语欺凌又是其中最常见欺凌形式,这跟表2的各欺凌形式共同发生率的结果一致。此外,与C2、C3组相比,只有所有类型欺凌受害组存在较严重的网络欺凌,这说明青少年目前遭受网络欺凌往往提示着,其欺凌受害程度较严重,受害者可能同时还遭受着或者遭遇过其他传统类型的欺凌,网络欺凌受害者往往也是传统欺凌受害者,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Raskauskas, & Stoltz, 2007; Li, 2007; Smith et al., 2008)。此结果也支持了网络欺凌是校园欺凌现象在网络的延伸这一假设(张野,张珊珊,刘琳,吕晓敏,2015;祝玉红,陈群,周华珍,2014)。

4.2 不同模式欺凌受害者人口学特征和其抑郁、焦虑指标分析

不同模式欺凌受害者人口学特征的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级、学校位置、学习成绩等人口学变量间存在差异。与女生相比,在所有三类欺凌受害模式中,男生受欺凌的几率都更高,欺凌受害模式的性别差异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Rivers & Smith, 1994; 张文新,谷传华,王美萍,王益文, & Kevin Jones, 2000; 陈世平,乐国安,2002; 陈健芷,刘昭阳,刘勇,2013)。这提示人们需要更加关注男生的受欺凌问题。在年级上,总体欺凌受害现象随着年级增长呈递减趋势,初中生的欺凌受害现象显著多于高中学生,但在不同类型上呈现略微不同的特点,在所有类型C1组中,初一、初二的欺凌受害现象远高于其他年级,C2、C3组中,则是初中三个年级均高于高中年

级,严重的欺凌受害问题主要发生在初中的中、低年级。对城乡学校的比较结果表明,学校位于乡村的学生比学校位于城市的学生在各欺凌受害模式中的比例均更高,支持了以往研究结果(吴方文,宋映泉,黄晓婷,2016)。在实践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学校欺凌受害的防治力度。以往关于寄宿对欺凌影响的研究认为农村寄宿学校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农村寄宿生相较城市寄宿生可能导致更多的欺凌(吴要武,侯海波,2017; 吴方文,宋映泉,黄晓婷,2016)。在本研究中,走读生和寄宿生的比较表明,寄宿生欺凌受害占比多于走读生但在各个欺凌受害模式上均无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学校位置与寄宿情况在对欺凌受害的影响上存在交互作用,农村学校寄宿和城市学校寄宿的差异及背后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不同自评学习成绩类型的学生,在各欺凌受害模式的比例存在差异,总体而言,自评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受欺凌的比例更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Schwartz, Chang, & Farver, 2001),与自评成绩较差和成绩中等的学生相比,C1组中,自评成绩优良的学生比例较少,C2、C3组中,成绩中等、成绩优良的学生较自评成绩较差学生比例更少,综合来看,中国学生自评学习成绩高似乎是保护自己不受欺凌的有利因素。

对不同模式欺凌受害者抑郁和焦虑得分的研究结果表明:各模式被试间抑郁和焦虑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遭受欺凌的种类越多频次越高,其抑郁和焦虑水平越高。值得强调的是,传统受害轻卷入组在抑郁和焦虑两个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未受害组,这说明只要学生有受欺凌的经历或感受,哪怕遭受的欺凌频度不高,看上去似乎问题并不严重,都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较严重的消极影响,各模式受害者抑郁、焦虑得分结果支持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零容忍”政策(赵一菊,王声湧,2018)。

4.3 教育和干预启示

2017年国家发布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体现了对校园欺凌问题的重视(姚建龙,2017),在校园欺凌涉及的人群中,欺凌受害者的占比最高(胡春光,2017),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发现学生有遭受某种类型欺凌时,应对该学生提高关注,注意其是否同时遭受了多种欺凌,尤其是网络欺凌,本研究发现学生遭受网络欺凌往往提示着,其欺凌受害程度已较为严重。对受害者受欺凌模式的探索,旨在了解欺凌受害群体内部的质性差异,本研

究结果发现,即使是遭受轻度的欺凌也会对学生抑郁焦虑问题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因而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教师、家长应防微杜渐,重视欺凌受害的苗头,不能忽略学生之间交流时存在的污名化、恶意嘲讽等微侵害行为,及时发现及时制止,以防欺凌受害现象的进一步恶化。此外,研究还提示,男性、初中中、低年级、乡村学校、自评学习成绩较差是各欺凌受害模式高发的人口学特征。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对青少年校园欺凌受害模式进行了探索,并对各欺凌受害模式青少年的人口学特征和内向性问题(抑郁、焦虑)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校园欺凌受害中,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这四种常见欺凌类型具有共发性,且存在四种典型的校园欺凌受害模式“所有类型欺凌受害组”(1.5%)、“传统类型受害组”(3.9%)、“传统类型轻卷入组”(14.9%)和“未受害组”(79.6%)。

(2) 言语欺凌是最常见的欺凌形式,大部分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同时也是传统欺凌的受害者。不同人口学特征(性别、年级、学校位置、自评学习成绩)会影响欺凌受害模式,男性、初中、乡村学校、自评成绩较差的学生更易受到欺凌。

(3) 即使是轻度欺凌受害卷入,也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对欺凌行为“零容忍”确有依据。

参考文献:

- Björkqvist, K. (1994). Sex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verbal, and indirect aggression: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Sex Roles, 30* (3), 177-188.
- Crick, N. R., & Grotpeter, J. K. (1995). Relational aggression, gender, and social-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66* (3), 710-722.
- Carlyle, K. E., & Steinman, K. J. (2007).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co-occurrence, and correlates of adolescent bullying at school.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77* (9), 623-629.
- Bear, G. G., Yang, C., & Mantz, L. (2016). Technical manual for Delaware surveys of school climat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tudent engagement, and positive, punitive, and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techniques. Retrieved from University of Delaware, Center for Disabilities Studies, Positive Behavioral Supports and School Climate. Project website: <http://wordpress.oet.udel.edu/pbs/technicalmanual-for-school-climate-surveys>. 51-65.
- Genta, M. L., Menesini, E., Fonzi, A., Costabile, A., & Smith, P. K. (1996). Bullies and victims in schools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1* (1), 97-110.
- Gini, G., & Pozzoli, T. (2009). 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and psychosomatic problems: a meta-analysis. *Pediatrics, 123* (3), 1059-1065.
- Gottfredson, D. C., & Dipietro, S. M. (2011). School size, social capital, and student victimiz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 (1), 69-89.
- Hawker, D. S. J., & Boulton, M. J. (2000). 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 Allied Disciplines, 41* (4), 441-455.
- Li, Q. (2007). New bottle but old wine: A research of cyberbullying in school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3* (4), 1777-1791.
- Menesini, E., Modena, M., & Tani, F. (2009).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ce: Concurrent and stable role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symptom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70* (2), 115-133.
- Nylund, K., Bellmore, A., Nishina, A., & Graham, S. (2007). Subtypes, severity, and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peer victimization: What does latent class analysis say? *Child Development, 78* (6), 1706-1722.
- Olweus, D.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Raskauskas, J., & Stoltz, A. D. (2007). Involvement in traditional and electronic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 (3), 564-575.
- Rivers, I., & Smith, P. K. (1994). Types of bullying behavior and their correlates. *Aggressive Behavior, 20* (5), 359-368.
- Rutter, M. (2000). *Resilience reconsidered: 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empirical finding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Handbook of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 Schwartz, D., Chang, L., & Farver, J. M. (2001). Correlates of victimization in Chinese children's peer groups. *Dev Psychol, 37* (4), 520-532.
- Smith, P. K., & Myron-Wilson, R. (1998). Parenting and school bullying.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3* (3), 405-417.
- Smith, P. K., Mahdavi, J., Carvalho, M., Fisher, S., Russell, S., & Tippett, N. (2008).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 & Allied Disciplines, 49* (4), 376-385.
- Wang, J., Iannotti, R. J., Luk, J. W., & Nansel, T. R. (2010). Co-occurrence of victimization from five subtypes of bullying: physical, verbal, social exclusion, spreading rumors, and cyber. *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 35* (10), 1103-1112.
- 陈健芷, 刘昭阳, 刘勇. (2013). 初中生受欺负现状及其与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 (5), 795-799.
- 陈世平, 乐国安. (2002). 中小学生学习欺凌行为的调查研究. *心理科学, 25* (3), 355-356.
- 胡春光. (2017). 校园欺凌行为: 意涵、成因及其防治策略. *教育研究与实验, 1*, 73-79.

- 胡星辰,张迎黎,梁炜,张红梅,杨世昌. (2014).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phq-9) 在青少年中应用的信效度检验. *四川精神卫生*, 27(04), 357-360.
- 李海垒,张文新,于凤杰. (2012). 青少年受欺负与抑郁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1), 77-82.
- 黎亚军. (2015). 青少年网络受欺凌与传统受欺凌的共发性.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2), 346-349.
- 邱皓政. (2008). *潜在类别模型的原理与技术: Latent class modeling: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 教育科学出版社.
- 曲姗,胜利. (2015). 广泛性焦虑量表在综合医院心理科门诊筛查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诊断试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9(12), 939-944.
- 苏斌原,张洁婷,喻承甫,张卫. (2015). 大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 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31(3), 350-359.
- 王丽霞,汤永隆. (2016). 青少年心理弹性的特点及干预策略研究.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4, 4-7.
- 吴方文,宋映泉,黄晓婷. (2016). 校园欺凌: 让农村寄宿生更“受伤”——基于 17841 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实证研究. *中小学管理*, 8, 8-11.
- 吴要武,侯海波. (2017). 校园欺凌的影响与对策——来自农村寄宿制小学的证据. *劳动经济研究*, 6, 36-55.
- 谢家树,吕永晓, Bear, G. G., Yang, C., Seth J. Marshall, & Rong Gong. (2015). 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中文版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4), 594-596.
- 谢家树,魏宇民, Bear, G. G. (2018). 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学生卷)中文版再修订及初步应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2), 259-263.
- 谢家树,谢璐, Chunyan Yang, C., Bear, G. G., 凌宇. (2016). 中美青少年校园欺负受害问题的比较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4), 706-709.
- 姚建龙. (2017). 防治学生欺凌的中国路径: 对近期治理校园欺凌政策之评析.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1, 19-25.
- 张华,丁新胜,王庆云,韩成秀. (2016). 农村留守初中生心理弹性的特点.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4(6), 928-932.
- 张洁婷,焦璨,张敏强. (2010). 潜在类别分析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心理科学进展*, 18(12), 1991-1998.
- 张文新,谷传华,王美萍,王益文, Kevin Jones. (2000). 中小学生学习欺凌问题中的性别差异的研究. *心理科学*, 23(4), 52-56+127-128.
- 张文新. (2002). 中小学生学习欺凌/受欺负的普遍性与基本特点. *心理学报*, 34(4), 57-64.
- 张兴慧,李放,项紫霓,王耘. (2014). 儿童青少年校园受欺凌潜在类别及与焦虑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4), 631-634.
- 张野,张珊珊,刘琳,吕晓敏. (2015). 中学生传统与网络欺凌结构特征的比较研究. *现代中小学教育*, 31(8), 58-62.
- 赵一菊,王声湧. (2018). 预防为主遏制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 *中国学校卫生*. <https://doi.org/10.16835/j.cnki.1000-9817.2018.09.001>
- 祝玉红,陈群,周华珍. (2014). 国外网络欺凌研究的回顾与最新进展. *中国青年研究*, 11, 80-85.

Patterns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a: Based on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XIE Jiashu¹ WEI Yumin¹ ZHU Zhuorong²

(1. Cognition and Human Behavior Key Laboratory of Hunan Provi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0900 Euclid Ave., Cleveland Ohio 44106, US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possible patterns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hina. Methods: By cluster sampling, 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 (DBVS-S),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7 (GAD-7) were administered to 3761 secondary school adolescents in Hunan Provinc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 was conducted on victimization by verbal, physical, social and cyber bullying. Results: (1) There are high degree of co-occurrence among four subtype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Four latent classe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an all-type (traditional and cyber) bullying victimization class (1.5%), a traditional victimization class (3.9%), a mild traditional victimization class (14.9%), a non-victimization class (79.6%). (2) Males, junior high students, rural students and poor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all types of victims. (3) There was a grad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ur latent classes and level of depression as well as anxiety.

Key words: bullying victimization; co-occurrence;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health